

作家走读中梁宝龙·永康府·作品选登

街里依

左米

在我少年时的记忆中,进城是一件很刻意很隆重的事。

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进城,隐约是我10岁那年,那时部队转业回家的二舅在车站上班,外婆带着我一大早就去赶车。从我们的小镇到永康县城有二三十公里路程,那时候坐车感觉无比遥远漫长,途中一次次的停车上下客,车里的柴油味令人头昏脑胀,到了城里车站下车,我已经是晕乎乎的提不起一点儿精神了。晕车的后遗症就是呕吐打哈欠,记忆中的那次进城就是紧紧拉着某人的衣角埋着头两只脚机械地迈动跟随,也不记得跟着他们去了哪里干了什么事。唯一记得的就是那一年的过年新衣是二舅买给我的一件鲜红的滑雪衣。

再一次记得的进城是在我15岁,跟着母亲从解放街上街走到下街,在和平桥附近的自由市场买了一条裙子一件衣服,那是一条墨绿色的半身百褶裙子,衣服是一件鲜黄色的缎面手感的衬衫。每次穿上那身衣服时,心里都有着一股庄重的仪式感,因为这是从县城里买来的。

再一次记忆深刻的就是中考后决定继续上高中的那一年,说来惭愧,我是一个差一点儿就没法上高中的人。跟着外婆和母亲一起进的城,无非也是从解放街的上街走到下街,逛完百货大楼后,在十字街口旁的商业大厦一楼为我配了一副近视眼镜,而在之前我是一直掩藏自己近视这个事实的。后来为了给我买一双合心意的皮鞋,又是沿着解放街上下街走了一遍,母亲那时对我生气地责骂:就你最挑了,上街走到下街都挑不中一双鞋。只能说青春期是一个尴尬的年纪,父母挑的鞋我不中意,但是又很难挑中合自己心意的鞋子,然后就自己与自己倔强地闹着别扭,不肯将就。

在那之前以及那之后我其实应该还有过几次进城经历的,但是我的记忆顽固地只肯透露给我这些点滴。因为稀少所以深刻,也因此时时提醒自己:你是一个乡下人,偶尔进一次城就是你和城里人的差距。

19岁,是我跌跌撞撞走上社会的第一年。没有再跟随着长辈,自己单独进了城。也是从那时候起,我才知道被我们称为城里人的人,并不把自己说成城里人,他们称自己是街上人。那时上班的大楼几个公司共用一个厕所,我和同事在等厕所时谈论着头天晚上逛街的趣事,那时候我们唯一的社交活动就是逛解放街夜市。冷不丁从另一个隔间站起一个女孩,她有些傲气地冲着我们说:女孩子晚上还是早点回家的好,我们街上人父母是管的很严的。我们街上人这几个字透露着深深的优越感。是的,你们街上人父母管得严,我们乡下人来城里打工不跟父母住一起,我们晚上逛个街就是属于没人管教的是吗?那女孩的这几个字像个烙印一样一直磕痛着我,后来我才发觉那是我自卑的起点。

后来我与一个男孩子互生情愫,约会的场所常常是在黄昏时分的解放街和胜利街交叉的十字街口的那个电影院里。每次看完电影那个大男孩都会叫一辆黄包车先送我回住处,而我每次都会准备一些零钱在手上,然后以刚好有零钱为由在我下车时先付了黄包车费。他买电影票我出黄包车钱,我以这种方式在那场关系中维持着双方的平等。交往中慢慢知道,这个男孩不光只是街上人,还是个干部子弟,九十年代时,户口问题还是城里人和农村人之间的隔阂,我们谁也没有谈起这个话题,直至有一次这个男孩邀请我去他家吃饭。那一刻,我紧张了,这就是传说中的见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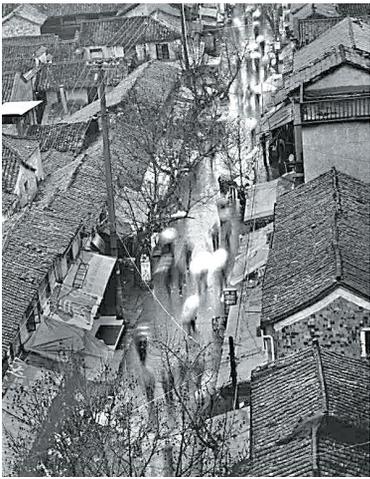
吗?我现在都清晰记得那天自己的穿着,为了尽显得体,我看中了解放街当店巷巷口一家皮鞋店里的一双皮鞋,这可是近半个月的工资啊,犹豫再三,在去看第三次时我终于狠心买下。那一天的晚餐很温馨,饭后和他们家人一起看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放着当时热播的电视剧《都市放牛》,剧里那个代表着乡下人进城的女性何水苗的角色,她的窘迫她的不安以及她的追求似乎就是我的影射。后来隐约听熟人说起有人给那个男孩介绍女朋友,女孩别的情况我没细听,但是我唯独听清了她是街上人。我和那个男孩之间从没说起过关于家庭背景的话题,就在那种你不问我不说的淡然中,强烈的自卑感驱使我做了一个自以为保护自己的决定——离开。我离开了县城,去了一个偏远的学校当起了代课老师。那时没有手机,没有彼此确切的家庭地址,我不清楚那个男孩之后的情绪。解放街、电影院、黄包车,县城的记忆都被我尘封进了内心的最深处。

随后的若干年,我不知道我还会来到县城,并且眼见着解放街一次次的变迁,武义巷那个经常买菜的菜场没了,扯过布的那个八间店没了,慢慢慢慢的,很多记忆都没了,甚至曾经和我一路吃着菠萝、从解放街的这头走到那头的闺蜜,也在时光荏苒中悄无声息地断了联系。站在从老县府的旧址上矗立起来的时代广场公寓高楼上,脚下的步行街热闹非凡,夜间的西津桥流光溢彩,左手边不远处是崭新的解放桥,右手边那曾经的荒芜是即将腾起来的繁华,我知道此刻在别人看来我已然也已经是街上人了。

左米 本名孙苗,1976年生,浙江散文学会会员,金华市作家协会会员,曾出版散文集《苗苗随笔》。

难忘老街

楼美如



从懂事起我就住在老街。少年时代常在老街玩耍,对老街有着挥之不去的印象。2008年得知老街拆迁,我时不时带着相机走回老街,九年下来,纪录了近万张照片,出版了《记忆永康》,算是给老街的祭奠,也是给自己子女留些碎片的故里记忆。

我小时候生活居住的地方,对面是蝶华照相馆,我跟着爸妈住在楼上,楼下是爸妈开的鞋铺。小时我感觉自己家很大,其实只有十一二个平方米。我妈特别好客,每当集市,我家总是十分的热闹,爸妈老家赶集的人会上我家吃饭,一些不知名的乡下人挑着担的,背着箩的,总会把东西寄存我家,把店挤得满满的。

老街上住着的都是老邻居,老街坊,在街上行走碰到的几乎都是老面孔。即使叫不出名字,也都知道是谁家的,可说出他家一两个人名。

老街的买卖很是兴旺,商场里买不到的东西,往往可以在老街找到。集市的老街更热闹,许多新鲜的玩意常常会在集市中出现。

乡下人有点多余的东西,都会集中在集市那天拿到街上卖。解放街原住民很多是农民,自家种的菜吃不了,也会拿到街上卖。

老邻居知道我在纪录老街,纷纷向我介绍,讲述老街的历史、故事。他们说的活龙活现,有道说:老街是建在龙背脊上,上街为龙头,东、西街为龙爪,龙尾摆入永康江。街民还肯定的告诉我有永康就有老

街了。为证明是否属实,我查阅永康老县志,发现清康熙的县志开始出现图标,确实只有老街一条街道。

那个时候的老街没有街名,都是按牌坊标示位置所在。民国时期曾叫中山街,永康解放时,解放军从这条街进入县城,解放街由此得名。但我们小时候没人叫解放街的,都叫上街下街。

据道光年间的县志记载,西街已经完整出现。西街原住民说,西街自建至终未有拓展,是一条最原始的古驿道。曾经也是最繁华的区域,不足三百米的西街,拥有过四座学堂、十五座祠堂。

老街即将被高楼大厦淹没,我却高兴不起来,可能是我守旧、老化了。老人就喜欢怀旧,如果能在新城掀建之时,留住些老永康的古道、古宅群落,让老永康人有个怀旧的场所,那该多好啊!

楼美如 市财政局退休干部,爱好摄影,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出版、主编摄影书籍有《记忆永康》《永康味道》《写意永祥》《农耕永康》等。

解放街170号
(外一首)

蒋伟文

一切已不存在,那油漆脱落的门牌,破旧不堪的木板墙。临街的蜗居和窗外那棵夏天的梧桐树。不存在的过道边,有一间不存在的淋浴房,不存在的浴室门洞里,有时候露出四只大脚板。木楼梯吱吱嘎嘎通往二楼的窗,突然大街传来叫喊声,谁从下面扔进一串钥匙叮当响。深更半夜,逃窜的老鼠踩在你的脚背上,不小心它也会掉进厕所的臭粪缸。曾经,这里住着我的好兄弟:纯情诗人当上了团委书记。散落书桌的诗集,堆在地板的脏衣服。晚上我们尽情地玩吧,要么去约会,如果牌局失利,他一定又遇上了心仪的姑娘。啊,友情的集散地,青春的收容所。而我的回忆已失去方向。一切已不存在,当推土机碾过记忆的废墟,不存在的地方升起了一幢幢新房,从不存在的窗口探出一张被时间磨损的脸,回望上世纪九十年代,永不消失的街景。

老城区

容纳美好记忆的不是世纪广场,也不是占据了郊区农民菜地的高楼大厦,而是老城区的一条巷弄、一座老房子、一摊馄饨店。而时间总是催促我们的脚步,向前,向前。我们往前走。老街原本是宽敞的,现在似乎变窄了,只有一溜儿。店铺冷冷清清,路边垃圾没人清理。老房子日渐衰败。几年前主人迁出老城区,租住这里的大都是外来人员。邮电局如今是超市,新华书店成了快餐店。只有行道树还是原来的行道树。我们沿着熟悉的小巷走,以为还能找到学校的后门,但是此路不通,前方正在拆迁。眼前这一切以消逝的方式促使我们重返青春岁月。然后掉头。而你不再是曾经的你,我也不可能回到我自己。

蒋伟文 永康市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创散文诗,作品入选《中国年度散文诗选》《中国散文诗90年》《新世纪优秀散文选》《新中国六十年文学大系·散文诗精选》等,著有散文诗集《守望家园》《寻找爱情遗址》《证据》。近年习分行写作,在《上海文学》《飞天》《诗江南》《诗歌月刊》《文学港》发表组诗。

